

《忧乐为天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忧乐为天下》

13位ISBN编号：9787203093212

出版时间：2016-1-1

作者：林嘉文

页数：3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忧乐为天下》

内容概要

西夏学泰斗李范文亲笔题签。

宋史名家李裕民破例作序。

学界推荐：

读一读林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准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

——宋史名家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裕民

范文正公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庆历诸公之真精神，一传为王荆公、张横渠、二程子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再传为朱晦翁、陆象山“以身任道，舍我其谁”，三传为王阳明、东林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遂为我中华文化不朽之魂魄。吾友林嘉文君，聘少年高才，挥如椽大笔，所撰高文大着《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表彰文正诸公之大功业，弘扬其真精神，于当今之世，又岂止有功乙部也哉！林君志向高远，更得硕德名儒真传，精进不已，臻于学术高峰，必矣！

——山东大学教授范学辉

《忧乐为天下》

作者简介

林嘉文，男，陕西西安人。主要学术兴趣为西夏学、宋史。著有历史随笔《文景之治》（出版时更名为《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版），史学专著《救斯文之薄：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出版时更名为《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山西人民出版社）。另撰有短评、随笔若干，部分曾发表于《东方早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刊。2016年2月24日自盡，留有遺書，年18歲。

书籍目录

序（李裕民）

自序

第一章 山雨欲来：范仲淹的早年经历与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势

一、岳州故事

二、幼年坎坷

三、苦学生涯

四、北宋的建立

五、边患重重

六、贫弱之局

第二章 万千气象：仁宗朝初年的士人结盟与朋党政治

一、范仲淹早年的仕宦与思想

二、“救斯文之薄”

三、“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四、“四贤一不肖”

五、西北军政的压力

第三章 同道为朋：革新思潮下的同志士人与庆历新政

一、“患法之不变”

二、天章阁对策

三、庆历新政的十条纲领

四、吏治改革与其他

五、欧阳修的文史之学及其思想史背景

六、虚虚实实的“朋党”

七、庆历兴学与“宋初三先生”

第四章 人散曲未终：新政的天亡与北宋的士大夫精神

一、“天下议论相因而起”

二、“当世已不容”

三、“自知其不可行”

四、政治、权势与“风”

尾声：波峰浪谷——近世清流的命运

附录1：晚唐至宋初社会历史大背景与庆历新政

附录2：关系、范式、历史想象——对历史研究的若干随想

参考书目

后记

《忧乐为天下》

精彩短评

- 1、捧杀
- 2、2017年的第五本书，在休假后才看完，很难想象有这样热爱研究历史的同学。也是因为易川推荐才看完这一本书的。他说，未来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愿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 3、唉，结束了！
- 4、当小说看完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该苛责，也不该捧得太高。
- 5、不拘一格降人才
- 6、可惜了，真的是天才。
- 7、上穷碧落下黄泉基本就是大众学术。年青人要爱护自己，不要独面大众。
- 8、感觉写的过于烦琐，很多东西反来复去在讲，看了一半还是就放弃了。
- 9、刚刚买到《忧乐为天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了，越看越觉得痛心疾首，自问对历史研究多年也颇有心得，但是与林先生相比，真的是望尘莫及，所以说，新闻报道中所言的“一般的硕士博士都达不到他的水平”这绝非夸张和虚言，尤其是当我读到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有着非常先进的史识和史论，其见解非常之独到，甚至敢于向陈寅恪、田余庆、李开元等史学名家发出质疑，魄力非凡，同时，林先生还具备了谦逊的学术品质，如果能假日时日，绝对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家，然而，这一切全都停留在了十八岁，痛哉！
- 10、#庆历新政# 范仲淹：我从小家里穷，寄人篱下，23岁离家出走读书，国家不行啊，治理不好，边境动乱，我（老百姓）的日子就过不好，没办法呀，只能帮忙政改……
- 11、令人叹息！
- 12、斯文之薄不可救！写完书就写遗书，下辈子投胎去大宋！
- 13、作者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值得我辈认真学习和反思。可能是由于年龄问题，作者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少，全是“历史”，有点单调；前后部分有不少重复内容。
- 14、自己的书，下个月才会铺货上市。书一出版，总会有遗憾，白纸黑字难收回，错漏之处全赖读者包涵了。
- 15、前半本认真地读，后半本大概的读。佩服林嘉文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水平，但也觉得他的自杀是在可惜。另外就是这种历史描述实在是觉得枯燥，我的历史没救了，可是接下来还要看史学反思和天下当代性那两本。
- 16、作者今天去世了，抑郁症。走好！（2016，2,24）

1、林同学的书，花了一个多礼拜，断断续续读完了。读完以后，内心的感受很复杂。为本书作序的李裕民教授评价说，此书可入「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我在这方面虽无造诣，但纵览全书，仍不得不叹服于林同学在史料、史观和历史书写方面的卓越才能。其基本功之扎实，我等站在历史学门槛之外的小学生，恐怕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能赶上。真是惭愧啊，看看林同学的水平，再看看自己，我哪还有脸面揣着历史科目的教师资格证进课堂，分明是误人子弟啊！说回这本书本身。关于那段历史本身，我没有深入了解过，毕竟自己的学术兴趣一直都在近现代史。但是读着正文的时候，我却感到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直到读罢掩卷，才彻底想清楚自己熟悉的是什么：是那种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一脚踩空、却还是要义无反顾的无奈和胆魄。庆历新政并不是时势造英雄、把改革家推向风口浪尖。也不是英雄造时势、看英雄人物大刀阔斧力挽狂澜。促使新政上台的最主要力量，是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群体。弊政有没有？有。外患有没有？有。需不需要改革？——这个就要看士大夫们怎么说了。本书总结道，「庆历新政是被士林舆论抬起的改革运动」，在现实的改革需求之上，对推动改革起最主要作用的还是士大夫们的改革呼声。这景象让我感到万分熟悉。士大夫推动改革，仿佛就像是古代版本的「舆论倒逼改革」和「民意倒逼立法」。两者的相似之处：其一，支持者们表面上维持着难得的共识，暗地里各有各的具体诉求；其二，支持者们有着充分的建言权利，却不用为其言论负责（群众造锅，领袖背锅）。当然，士大夫们的分歧，主要还是在新政的具体操作上，而不是在利益方面的诉求上，但这已经足以拆散新政的舆论根基。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政开始后，支持新政的士人们「对新政的节奏、手段、力度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不同认识」，这很快便瓦解了新政在朝廷中的「群众基础」。不能不说，这也是新政被迫中止的原因之一。新政的只执行了一年多就被迫中止，恐怕范仲淹本人也预料不到吧。他心里盘算的是长久之计，但士大夫们却急着要他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一旦不满意即高叹「要你何用」。今天的我们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知道一年的时间并不能看出什么效果。然而当时的改革派士人，却并没有太多耐心。今天士大夫们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改革给鼓动起来，明天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把你给赶下台去。无非是今天批判的是别人，明天批判的是你罢了。可见舆论往往是短视、肤浅、下意识的，即使是执政集团的内部。倘若没有强大的组织控制能力，孤零零的执政者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输家。我忽然联想到一句外国的歌词可以描述这样的场景：「My castles stand upon pillars of salt, pillars of sand.」范仲淹的晚年，辗转在地方之间调动。依我愚见，在经历过波澜壮阔的上下浮沉之后，最后调任地方知州，也算一个不坏的结局——这才是最能发挥自己理想与才干的位置啊。在人生的倒数几年里，能为百姓做些实事，也算是知行合一，践行了一代名儒的人生准则吧。-----本文草草而成，竟能与作者的自述共同发表在这本书的评论版块，成为第一篇书评，实在有些脸红。于是愧将自己读此书时，在书上划下的笔记，都扫描、识别成电子档，并发表在本书的「笔记」版块，希望能弥补各位读到晚生这篇急就章时的不快。地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6685892/annotationp.s>。很想与如此有才的本书作者见上一面，但再也没有机会了。惋惜！叹息！

2、对不起，这不是书评。书还没有拜读，但少年英才的自杀令我震惊。看了遗言，我心益发沉重。我不认为这是简单的抑郁症，抑郁症是官僚式的遮羞布，如今但凡有点思想的人自杀以后都会被用这块布裹住止言。但我也不能再展开，遗言中的解释其实已经很明白。希望林嘉文君在天之灵允许在此转贴他的遗言。http://www.youth.cn/preview/news.youth.cn/sh/201602/t20160224_7671026.htm西安中学确认：17岁史学天才林嘉文跳楼身亡 林嘉文：最后的话 终于还是要离开。一走了之的念头曾在脑海里萌发过太多次，两年多来每一次对压抑、恐惧的感受都推动着我在脑海里沉淀下今日对生死的深思熟虑，让我自己不再会觉得自己的离开只是草率的轻生，让我可以以为我最终的离去不仅是感性地对抑郁、孤独的排解，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达。 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没意思了。更何况我精神上生活在别处，现实里就找不到能耐的下脚的地方。活着太苍白了，活着的言行让人感到厌烦，包括我自己的言行，我不屑活着。离世前唯一的担忧是我的遗体大概会很难看且任人摆布，周围的环境决定了人很难有个体面的活法，连小小的中学里也处处是浓厚的政治气息(举一小小例子，西中教学楼内教师办公室靠走廊的的门窗无不是人为地被用纸贴上或用柜子挡住，或者干脆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就没建窗户，而学生教室却可随时被人从窗户向里一览无余，这就是种显而易见的对等级氛围和身份权利差异的暗示，套用周振鹤先生的概念，可谓之校园政治地理学。可叹很多老师从

《忧乐为天下》

没意识到过他们这种不自重，用寡鲜廉耻评价毫不过分，因为他们一面对自己享有的这种特权安之若素，另一方面却大量抱怨着中学老师社会地位、收入、学校里面领导的官僚化作风，却不反思自己），这样的社会风气里，容不下安乐死这样很个人主义的事的，因为总有人想榨取别人，自然不能放别人自由地生死。

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更何况我相信那些芸芸大众里的旁观者，只会给出那种为我所不屑的轻薄、庸俗的解释。你们知道吗，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我给除刘雅雯外的每个人——包括我的亲人与学友——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内心竟然有种施舍般的悲悯。我想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好让你们以对我的狂傲和自以为是的嘲笑，来减少点你们心里的恐惧。

遗嘱见下：

- 1、本人去世后，我所有著述的著作权都转赠给刘雅雯。这是我对刘雅雯的心意，两年多来我一直对她有爱恋。另外，我觉得她是最能确保不让我的任何著述在我去世后出版、再版的人。
- 2、我的藏书，凡是摆在书房书架和卧室书架上的，全都转赠刘雅雯处理。余下书籍，由我父母处理。转赠刘雅雯的藏书有一些与西夏学、黑水城研究、民族史相关的书籍以及一些古籍，如果刘雅雯觉得用不上，烦劳刘雅雯挑出来转给王荣飞和胡耀飞处理。
- 3、希望我的父亲能知足，珍惜我的母亲，同时改掉自己家长制的脾气以及极差的饮食追求，认清自己实际的生活能力和状况。太爱出去跟别人骑自行车，其实是不够挂念妻子和家庭。不要再保持那种单身宅男才会有的饮食习惯了，不健康，且这种饮食习惯是对性格和责任心的投射，说明人活得浑浑噩噩。
- 4、希望我的母亲能振起精神来多抓抓工作，多去挣钱。这样若我父亲先离开，至少还可以维持生活。一个志在过小日子的人，精神也会很脆弱，要学会找些东西依靠。金钱是可以依靠的，另外还有志业也可以支撑人。
- 5、剩下两次心理咨询，建议我父母分别去找郑皓鹏谈一次。我的离开不需要、不应该追究任何人，尤其是郑皓鹏，否则就是在侮辱我。我连我对刘雅雯的爱恋都没对郑皓鹏坦白过，而且我的心理问题太形而上了，郑皓鹏似乎比较适合解决诱因比较具有现实性的心理问题。
- 6、感谢西北大学招生办刘春雷主任邀请我报考西北大学，很抱歉辜负他一片诚意。谢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将我评为夏令营的优秀营员。谢谢邓小南老师的关照。
- 7、每次去李裕民老师家都能感受到平日很少能体会到的温馨和安稳感。我对不起李老师夫妇对我的关爱。
- 8、谢谢李范文老师一年多来对我的提携，答应给李老师整理《同音研究》的事也做不到了。恩情难报。
- 9、向我的“朋友”们致歉，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但我天性敏感，总是善于从在貌似愉快的氛围中的发生的小小分歧里窥探出自己与别人的殊途，让你们为我这么一个于你们活下去无意义的人耽误了些许时光。
- 10、我要承认我对历史研究的日久生情。之前在媒体上抑或私下里，总冷冰冰地说历史研究只是渐渐随年岁长进而被我习惯的工作而已。但活到最后，对之还是曾有过牵挂。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无用的历史研究曾让我底气十足。虽然我的两本著作烂到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我对古人的历史没什么兴趣，但每当我为活着感到疲惫、无趣时，对比之下，我总会自然地想去缩进历史研究的世界。但是即便是做研究，也并非能让我拥有尽善的生活感觉，因为有太多虚假的“研究”，还因为本质上少有其他会对研究爱得纯粹。一个人喜欢追索，哪怕是对任意领域的，都会受到现实的阻挠和精神的压迫。问太多、想太多是种折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人会很难活得简单肤浅起来。好像说远了，其实仅就对做历史研究的想法而言，我只是想明白了心有天游，拘泥在一门学问之中，那样活着也是很庸碌的。

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林嘉文 2016年2月23日 于西安

3、<图片1><http://www.xazx.cn/C2/content.jsp?id=10556>《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出版座谈会发言

2015.12.16 林嘉文尊敬的李裕民先生、曹伟院长、张艳云老师、范希望老师、贾连港老师、胡耀飞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崔人杰兄，以及西安中学的校领导和各位老师，还有媒体的朋友：请允许我首先为自己今天要念稿发言致歉，因为一般来说随性的脱稿漫谈可能效果更好，且通常更合乎我的习惯，但我尤其想在今天这个场合用念稿这种形式上的严肃和控制来表达我对各位的尊敬和感谢。其次要感谢各位老师腾出宝贵的时间在今天下午前来为我和我的这本不入门的小书赐以斤斧，感谢下午因有课而未能与会的王双怀老师赐书为我祝贺。一般老师们其实都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免不了要讲套话，即便是实话实说，未免也会因耗费时间而让人觉得兴趣寡然，但老师们今天还是拨冗前来，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薄面，这全蒙老师们对后学的拳拳关爱和郭老师的支持，所以我今天感激倍至。我这本小书主要完成于高一期间，后经胡耀飞兄引荐，由崔人杰兄操刀，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尽管我在私下里时常讲，作为出版稿，我并不满意书稿现在的样子，不仅因为我知晓自己的书稿中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更因为它甚至并非书稿的原貌——崔人杰兄在编辑时删减了全书的一些注释和正文，同时调整了原稿绪论的位置。但现在平心而论，那些正文和注释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删减，要么是被编辑觉得有碍阅读，要么是本身谈得太散漫了，总的来说还是我的问题。当初写作这本书时，受限于出版要求、紧促的时间以及糟糕的身体状况，很多东西弄得都很粗疏，而且当时曾反复思虑要不要出书，因为我出上一本书纯属偶然，那只是初中时读书之余的戏笔，我当时也可以说是有意，也可以说是无意，专门选了一个不关乎我专业方向的内容为选题，自打交稿以后，我一眼都没再敢重看那份稿子，因为感觉以那本书语言之轻薄和错漏之多，恐怕会压得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吧。后来我觉得自己年轻，出书越早积攒的都是黑材料，其实我自己一不贪财二不贪名，写文章只被我当作是督促学习，但是我很怕成为众矢之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舆论其实也不太偏袒年少有名的人，历史学本身也不是什么要拿来张扬的学科，所以当初很犹豫出这本书。不过最后还是出了。这次这本《救斯文之薄》本身要比上一本要严肃很多，我自己态度也比较认真。书稿叫《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其实原名叫《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一开始我是奔着叙事的目标去写这本书的，这个可以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几节内容里看出，第一、二章的一些写法可不单单是为了吸引阅读，里面涉及的景物典故，我都做过必要的考究。但我后来发现真正高标准的、精致的历史叙事本身比完成一般的史学论著难度还大，而一般依据大众材料做出的普通叙事，像过去程应镠先生的《范仲淹新传》以及其他几本范仲淹传记，其实做得已经比较到位了。所以越到后来，我的写作意识越发转向去解决问题。在这之中，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方面有了三点体会，分别是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以及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党争还有新儒学运动，从材料利用上来说，即便充分参考墓志和方志，能对传统文献起到的补充也极其有限。上世纪的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静态的，到后来就给人题无剩义之感，或者说选题还有不少，但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难以提升。新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为了突破这种困窘，强调从实际运作的角度重视制度和人事的联系，关注人事对制度的解释、运作甚至创造，以及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包公和邓老师他们提出的所谓的“活的制度史”。这套想法后来又有所扩展，开始关注文书传递、政令运作，另外还有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当然这之中还有不少尚待辨析的概念，比如政治文化，它的概念边界其实特别模糊，近来也有滥用的趋势。我自己在研究庆历新政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这些经验。因为对庆历新政在材料的搜集上，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了，所以就需要在理解上上一个台阶。之所以要把庆历新政放诸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是为了点明范仲淹有超越救治时弊的现实目的而志在起兴斯文的追求，以及庆历新政本身有着救斯文之薄的更大目标，从而也就把庆历新政从通常的历史叙事中脱离出来了，因为一般的宋史叙事都会将庆历新政视作北宋变革现实弊病的前奏，而忽视它作为范仲淹等人实现儒家理想的个性化尝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基于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的考察同时也解释了庆历新政失败原因中的两点——一个是苏舜钦讲的新政的很多措施被世人认为“皆非当今至切之务”，显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体会范仲淹那种志在斯文的精神；另外就是在新政还未实行和实行的初期，科举士人们在大目标上的趋同遮盖了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观点分歧，进而导致了新政的夭亡。除此以外，包括我在书稿中对五代至宋初文学革新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的梳理，以及我对五代至宋初士大夫“文”“吏”属性演化的论述，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和政治态势的互动关系的关注这样一种大关怀而得出的。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历史书写，我在书中粗略地对作为政治概念的庆历新政和范仲淹进行了文化阐释，这也是对本世纪初以来宋代政治史新研究方法的借鉴。我提出，在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笔下，在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著述中以及在明季士大夫的议论里，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描述不断走向抽象化和符号化，成为体现他们政治立场或者精神诉求的载体之一，这种现象遮蔽了和塑造了后来人对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的通常认知和考虑思路，进而限制了研究。但是，“活的制度史”以及对权力关系、人事网络的研究固然开辟了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的新路径，可方法、理论的提升或许并没能从根本上为政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境界。近年来我们宣讲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问题，也无非是将对典型政治事件中参与者的关注由主要士大夫转移到一般士大夫——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身上，另外就是留心像强至那样的下层士人的境遇，还有就是关注基层运作、基层的社群组织，以及深化对多样化士人关系网的复杂性的研究。其实这些问题意识本身并不难考虑到，只能说以往相关的研究积累不足，显得这些问题有新意，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很多领域的研究空白被迅速填充，平面化的研究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似乎陷入了一种新的停滞。我觉得未来的政治史研究还是要对传统的大问题保留一定兴趣，这不仅是学术发

展的要求，也是学人自身素养的要求。但问题意识本身又不能不发展，这就要求对北宋政治史的研究不仅要提升研究方法，更要去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比如本书中提到的党争问题，在以往，没有人怀疑过党争本身这个问题成立的条件和动态性，即便是寺地遵、平田茂树的“政治过程论”——这是黄宽重先生认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趋向的范本——也强调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最下层之间势力集团的联系。我记得陶晋生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宋士族》的书末还曾制了一张十几页的表格叠在一起，梳理从赵匡胤到北宋中期士族的婚姻关系。但正如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士人间的姻亲、同年等关系和他们的政治取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譬如欧阳修与胥偃是翁婿，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以士人关系来分析政治事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先设立场，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在滕子京用公使钱的事上，有些著作为了证明王拱辰是其他参与弹劾的台官的幕后主使，就举例王拱辰在滕子京被轻责后依然不依不饶，说王是为了借范滕的同年关系压倒范。这种想法本身就未加考量地先设了朋党之争的事实存在，可在同一著作中，作为所谓的范仲淹同党的杜衍却因公然批评滕子京的贪污行为而被誉为公正，这是典型的先判断了好人坏人，有二重标准。况且王拱辰在进奏院狱中作为苏舜钦的荐举人之一同样弹劾了苏，所以即便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顺应了王拱辰的一些情感，但断然不能将这些政治事件上升为有谋划的政治阴谋。在以往对士人人际关系的梳理中，那种具体化的趋向往往是有选择性的，本身对士人关系的研究追求的是细化，可实际上学者容易在追索中一叶障目。我觉得真正细致的考察会得出的是在所谓的有联系的士人关系网之下，更密致的是面临具体事务时无取向规律的选择行为。因为看似同道的士人，在一些时候却会有分歧；所谓对立的双方，却常常在执行某件有着立场倾向的事情中有着妥协和配合。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一些在北宋中期看起来摇摆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物了，比如张方平。对于所谓的党争，我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摒弃党争这一先设的印象，而从具体情境里士人行为的利害角度入手。樊树志先生研究明代东林党，他直接说党争向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一套舆论攻击的说法，这种想法也不合适，且不论樊先生那些文章，完全是顾完成他们说什么樊先生就信什么，他这种论断，本身也是以偏概全，忽视了作为历史表述的党争，其真实性时有时无的动态。历史上在一些时候，党争是确实存在的，但另一些时候它只是纯粹的舆论工具，所以还是要具体地看待，不能犯范式癖。另外，那种情谊关系对政治取向的影响作用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就像我在附录那篇文章的开头提到的，像类似于何冠环先生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曾枣庄先生《文星璀璨》那些研究，基本都是由因寻果，从一个同年科甲榜单入手，看这个榜单上的人在一些他们共同参与的事情上的表现，而类似祁琛云老师的《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那样的研究则是由果寻因，通过考察士人社会背景的共性，寻找其中有没有科甲同年这个因素，若有，则进而推论科甲同年关系对事件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窃以为，由因寻果的遗憾在于可以去考量、解释的事件的范围受到了局限，而由果寻因则会使得在探寻事件发生机制的时候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最典型的就是祁琛云认为景祐党政的产生是由于欧阳修等人不满高若讷作为同年却不和他们立场一致声援范仲淹，可这只是祁琛云的逻辑推测，文献上一点影迹也没有，相反，至少在台面上所有人都是从政见分歧的角度攻击高的，可见政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况且同年意见相左很常见，祁琛云是预先觉得同年就该一致，才会推论欧阳修他们曾以同年之谊拉拢高并因高“为谏官而不能辨”的不合作生气。其实，反思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先设——或者说惯常的学术路径依赖——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悖论，之所以以往对庆历新政的研究总是自然地顺着党争这条思路走，其实是被欧阳修、苏舜钦他们的表述以及一些历史书写误导。欧阳修他们自己没有史家的后见之明，是不会从新儒学运动的背景去观察他们自己的，但是作为实际政争的亲历者，他们在后来的历史解释中会自然地 toward 读者传达他们的立场。比如解释王拱辰等人行为的阴谋论，就是最早出自苏舜钦自己写给友人的书信；把公使钱事件说成是借机搞党争，这也是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里的说辞，今天人很多见识也基本还就是沉浸在古人的一面之词里，当然，北宋士大夫写文章本身都很强势，感染力很强。在以前，对庆历新政的研究，被人简化成了几个事件点串联起的过程，天章阁对策、争城水洛、公使钱事件、奏邸之狱，这都是欧阳修、苏舜钦他们强调的几件事，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些事情跟庆历新政关系不大，特别是跳出那种附会的党争史观后再去看它们，一些说法的价值就不复在了。相反是一些中间过程的事，比如苏舜钦致信批评范仲淹，以前人注意的不多，诸葛忆兵老师注意到了，但是我觉得他理解得不合适。不是苏舜钦在信里说他对范仲淹失望就失望了，责怪本身就象征着不放弃，况且其实苏舜钦写的很明白，他提那七个建议的目的就是“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提的建议里除了立皇储，别的大体在方向上和《答手诏条陈十事》出入不大。不过我们确实有必要超脱旧的历史书写从而认识到欧阳修、苏舜钦、范仲淹、富弼等这些人之间细

《忧乐为天下》

致的分歧，包括认识到对他们的评价的抽象性，因为南宋以后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越发凸显，而且伴随着一种忧患意识，所以像朱熹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这背后有现实振作的需要，也新儒学塑造道德完人的需要，把范仲淹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形象都扭曲了。关于历史书写这块，全相卿老师10月份发了一篇分析欧阳修写神道碑的文章，他最后在文末讲的把神道碑当作文本（text）而非客观文献（written documents）来看，其实也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不过他批评王瑞来老师没弄清欧阳修写文章的背景，可他自己引用的范仲淹晚年说自己“大忤权贵，几成废放”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支持他的观点，相反王瑞来老师原来在几篇文章里其实是有意识到欧阳修他们在庆历新政后的思想转向的，而且王老师跟我一样，把这种思想转向方诸一种对儒道理想追求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全老师在小注里说王瑞来老师推断范纯仁对吕夷简有私愤这一点在文献上不可靠，这或许算得上反而是他自己把text当成了written documents。所以，虽然反思和超越历史书写很重要，但也该对目的论抱以适度运用的态度，在进行史料批判时不能忘却自我审视。不过全老师那篇文章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通过墓志和神道碑的对比看出富弼和欧阳修二人在写作时的立场差异，但实际上像富弼这些人，后来在具体的实现儒家治道的手段方面依然有想法上的变化，这点我在书的第四章里也有说明，只不过欧阳修转向算是比较早而且比较明显的，你像东英寿先生他们从日本天理阁本欧阳修的集子新辑出的那九十六篇欧阳修书简里有几支是范仲淹刚去世时欧阳修写给在徐州照顾范仲淹的孙沔的，其中就有表达对“打破名目，号为党人”的悔恨。当然，富弼这一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更细致的地方，除了《两宋名贤小集》里有《富郑公诗》一卷，他没有传世文集，这恰恰是李裕民老师指出的值得再努力的方向。以上交代的三点，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其实只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产生的诸多想法中的部分，而且有些也只是停在想法层面，书稿里也不见得充分地拿实证把它们表现了出来，主要是学识，还有我的精力、出版要求都不足够支持。所以我丝毫不觉得有这样一本小书出版，我对庆历新政，对北宋中期的新儒学运动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相反，这本书仅仅只是我研究的开始，故而以后还望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谢谢。

章节试读

1、《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73页

从实际境况出发，改革派在当时最应该做的是低调。实际上，新政本来推行得还算有条不紊，而且范仲淹等人经常在论述新政的合理性时抬出“祖宗之法”为新政做挡箭牌——这当然不是说范仲淹真的墨守祖宗之法”，邓小南曾指出，宋人对“祖宗之法”的阐释是多变的，它就是一种舆论工具而已——然而革新派中的年轻人们却不断出言造势，使得革新派陷入了太多不必要的言论争执。君子、小人之说一出，党议、党争之风迅速铺开，而这恰恰是最不利于改革派的。改革派被士林的舆论保举上台，可一旦士林中也发出指责他们朋党的声音，加上新政不能在朝夕之间见效，仁宗那颗本就疑心重重的心就会动摇。

2、《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9页

仔细考察辽宋议和经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辽朝统治者追求民族平等的诉求。因为长期以来中原汉人总是对少数民族政权抱有负面情绪，在传统的“天下”意识与边疆认识下，中原人总习惯地认为少数民族都是蛮不讲理、缺乏文明的“夷狄”，这很令契丹统治者不满，因而辽宋议和后辽朝坚持两国互称南、北朝，并以真宗为兄，圣宗为弟。这种君主间亲属关系的确立、“南、北朝”称呼的出现以及平等的外交礼仪和贸易关系的确立，都充分体现了澶渊之盟后宋辽间开始平等外交的事实。

另外，对于宋给辽岁币的行为，杨联陞说这是一种“倒过来的朝贡”，对此我不能同意，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朝贡”本身是一种表达地位不平等的举措，而辽宋之间不仅互为南北朝、君王互称兄弟，且从长远来看，宋朝损失财物，却在文化上对契丹本民族的传统进行了改造，这种文化上的征服使辽对宋在心理和政策上几乎毫无优势，或者说，辽的内亚文化传统在涉宋事务中几乎不能再给契丹人带来足够的外交底气和文化自信，又怎能说存在“朝贡”这种预示着地位不平等的行为呢。

总的来说，将辽宋议和置于大的历史潮流来看，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多数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沟通，缓解了双方的矛盾，维护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相互平等的地位。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很少能正视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总认为中国天子乃是普天之下至高之君。

二是北宋内忧外患的加剧。……北宋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崇文抑武的加剧，助长了北宋与辽议和的需求。总的来说，宋辽议和实质上是北宋在经历了宋太祖宋太宗频繁的征伐后国力转向低靡的体现，尽管北宋经济发齐发展得并不坏，文化也颇为昌盛，但事在人为，北宋政坛上下密布着一种贪恋现状的安稳情绪，宋太祖、宋太宗年间的锐意进取已难觅踪迹。这种政坛士风的颓废低靡延续到仁宗朝衍生出了青年官员喊出的革新诉求，最终成为导致范仲淹“庆历新政”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3、《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74页

千年前的经验告诉我们，文人政治尽管更容易促成民主，但民主的参与者如果缺乏民主的素质，那么自由言论权不一定会带来良性的讨论。欧阳修等人的意气用事，显然就是缺乏民主的素质。这并不是说要钳制言论，而是强调，士大夫党议、党争虽然发自他们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可以导向民主，但由文人党同伐异的心性促成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实在会令人抱憾和失落，尽管并不是文人政治和言论自由必然导致这种现象。

当然，在革新派士人日后被以朋党治罪的悲剧中，其实皇帝的责任更大。这就是人治社会封建专制社会的特殊之处，士林可以左右皇帝，却不能决定皇帝。欧阳修的君子、小人之辨哪怕再精彩，皇帝是以个人主观感受来判断的，尹洙对朋党就看得很明白，他说“或谓之公论，或谓之朋党。是则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是朋党还是公论，完全由皇帝自己感觉，哪怕你说的是公论，

《忧乐为天下》

皇帝觉得你朋党，你这帽子想摘都摘不掉。

4、《忧乐为天下》的笔记-一

1.“先忧而乐”的士大夫人格背后，是受佛教众生平等观点的影响。2.范仲淹在应天从学五年，也从来没有结过衣带。——类似董仲舒“三年不窥舍园”（生专心笃学，三年不窥园。苏曼殊《焚剑记》）3.“儒家的整体规划”——“得君行道”、“内圣外王”（余英时）4.现实政治发展不如意的时候，当“得君”不成以至在他看来难以“行道”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不屈从现实转而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里认为北宋士人积极政治是种外向心态，南宋理学强调“性命之学”，实际转向内在。范仲淹年少时广交佛道人物，日后还与隐居高士交往，都体现出他的思想中潜在的“转向内在”的意识。所以作者认为北宋开始在士大夫的思想中就有了潜在的“转向内在”的想法。5.宋辽檀渊之盟从长远来看，宋朝损失财物，却在文化上对契丹本民族的传统进行了改造，这种文化的征服使辽对宋在心理和政策上几乎毫无优势，又怎能说在“朝贡”这种预示着地位不平等呢？宋辽议和其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多数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沟通。——正视了中原政权同周边政权的关系。6.“积弱”的正确理解是北宋的综合国力很强，但实力运用的水平（资源配置水平）很差。宋代铁产量不低，但士兵中铁甲所占比例很小，显然与士兵的总体数量以及北宋的资源配置有关。强调宋代贫弱，是国人对近代以来西方来华的反感情绪所致。！7.“隐”是对现实失望后转而追求自我的修行，是“转向内在”，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对儒家理想的追求，而是在“行道”不成后依旧保持自我的高洁。我评：“竹林七贤”也是。8.女人政治本没有错，他的它的危害是对于男权政治的稳固而言的。9.“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范仲淹讲求文采与思想并重，文章的致用和道德教化意义。10.“儒者报国，以言为先。”11.宋代相权加强了？？宋代政治舞台是由掌握实权的宰辅导演的，而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让人摆布的偶像而已。宋代相权问题除了存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状况的区别。相权的加强是导致宋代士大夫政治产生的重要条件。

5、《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24页

范仲淹去世了，他虽非完人，却也在历史长河中侥幸得一时之士望，终得一世之芳名。任何历史人物，即便做出多少现实的功绩，但那些作为的影响都是有时效性的，超过期限，便俱往矣。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固然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作为，但他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思想、文学主张以及他提倡的士节、士风。范仲淹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着“救斯文之薄”的理想，弘扬古文、改良政治、提振士风、倡导兴学。尽管他的一生大多是在仕途上的，他最辉煌的时候也是他与君主关系最亲密的时候，但毋庸置疑，他一生更信奉他自己喜爱的儒家道理，他并非贪恋仕途，只是希望凭借入仕来实现儒家治道。正如他自己在写于临逝前的《遗表》中所说——“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途，不信贱官之能屈”。

6、《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25页

今日有学者站在支持新政的立场上对范仲淹的雷厉风行很是欣赏认为，新政推行就该大刀阔斧，触动他人利益也是必然不能避免。这实在是一种典型的受专制思想熏陶出的思维，强调专断、强调执行力。实际上正是范仲淹的专断，让新政失去了不少本不必失去的支持。范仲淹固然是士林代表，但并不能代表所有士人的利益，他的宰相地位本身，也就意味着与皇权的合作姿态。李裕民先生就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范仲淹激进甚至略有点专断色彩的改革，破坏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平衡局面，因为宰相专断客观上就意味着相权的不合理膨胀。

7、《忧乐为天下》的笔记-四

1.“救斯文之薄”是宋代具有自觉意识的士大夫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共同持有的追求。！2.清流文化始终频繁出现于动荡之世或内政疲敝之时，士人因责任感而积极参政。

魏晋时期士人个体自觉、独立精神萌发，魏晋清谈改良着士风，【？？独立精神激发着士大夫参政

的热情，因为他们更执着于对自我理想的实现。】

清代帝王集“道统”与“治统”于一身。

8、《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74页

作为政治斗争（景祐之际党议、党争）中失败的一方，他们对于敌对派别的舆论攻击在度上失去了理性和风度，所以吕思勉曾说：“宋朝的士大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兼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党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起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持不同意见的各群知识分子，立场不同可以尽述己见，但一味执着于相互攻讦，便毫无道义可言。

9、《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42页

庆历新政中很多政治事件的党争色彩其实是后来的史学家附会出来的。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曾援引清代刘咸炘的学说，指出唐宋以降的史学渐趋严整化，“史目”的固定使得撰史者总是有意将历史事件、人物向已有的史目中去，这固然方便于史家的记述与分析，却使得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变得狭隘且程序化。

仁宗时期的党争现象或许并非严重到足以干扰政治发展的主流，特别是庆历之际的党议不像宋朝后来的党争那样有着鲜明的权力之争的色彩。……相反，庆历党议更多展现出的是和而不同的高尚士风。在改革派士人的党争意识中，和他们党争的另一派有时并非一个固定的群体，而更有可能只是具体问题中个别的反对者。但是这种对象并不明确的、模糊的党争意识确实在客观上干扰了士大夫的理性，所以其负面影响并不能被否认，但也不宜说得太大，口头之争的激烈和实践中受其影响的程度是两回事。

10、《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07页

封建专制时代统治阶级政治改革，不论前台的政治家表现得如何出彩，幕后的专制君主总少不了要发挥作用。朝廷要改革，往往少不了掺杂皇帝个人意志的作用。宋仁宗在历史上广受称赞，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专制君主中饱受后世赞誉的皇帝，关键在于他得士大夫之心。这种受士大夫拥护的状态与当时他个人的政治理念谙合于士林的革新诉求有关。即位以来他也是经常纳谏，更重要的是，在有些学者看来；宋仁宗有一种强烈的角色意识，帝王的身份令他加强了自我的道德约束，同时也让他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心。他主观上有着把自己打成一个仁君一个广受士大夫拥戴的君王、一个和谐的士大夫政治的缔造者的价值取向。这种强烈的帝王角色意识，使他更愿意励精图治、听取士林的呼声，可同时也使他更在意治世的稳定和统治的牢固—前者令他成就了庆历新政，后者令他担忧仲淹等人的朋党。

11、《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93页

在仁宗朝这样一个时期，通变救弊的思潮已经不同于北宋前期的状态而已经在士大夫社群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只是，这种共识的坚定程度在不同士大夫那里并不一致，毕竟当时宋代内政之弊尚未达峰值，因而有的士大夫支持新政，却在日后受不了骤变、剧变。且归根结底，这种“救斯文之薄”的想法终归在当时只存在于忧患意识强、眼光长远的士大夫那里，祖宗之法的防弊精神为更多的士大夫以及社会群众塑造了一种易苟安的人格。

12、《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80页

《忧乐为天下》

很多时候，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常常被拿来和欧洲中世纪神学压制人性的现象作类比，可实际上此二者完全不同——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是以神断人，而朱熹的“灭人欲”并没有神学基础，他是以“理”断人，而这个“理”，不是神的旨意，而是儒家思想的要求。朱熹要求人们遵守原始儒家的礼教，同时还认可正当的人欲，他讲的“理”，没有宗教性。更重要的是，北宋新儒学运动对原始儒家学说的强调，在主观上本是为了增强士人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角色意识，是为了申明道义、提振士风，至于后世所谓宋代儒学使人臣仆化，恐怕至多只能称作客观效果，并非范仲淹等宋儒的初衷，也不是以他们的眼光所能预料的。更何况今人一味用“存天理灭人欲”等口号化的教条说辞来给宋代新儒学“贴标签”，这本身就只会造成片面狭隘的认识，这种认识全然不足取。

13、《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93页

在仁宗朝这样一个时期，通变救弊的思潮已经不同于北宋前期的状态而已经在士大夫社群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只是，这种共识的坚定程度在不同士大夫那里并不一致，毕竟当时宋代内政之弊尚未达峰值，因而有的士大夫支持新政，却在日后受不了骤变、剧变。且归根结底，这种“救斯文之薄”的想法终归在当时只存在于忧患意识强、眼光长远的士大夫那里，祖宗之法的防弊精神为更多的士大夫以及社会群众塑造了一种易苟安的人格。

14、《忧乐为天下》的笔记-后记

我曾自谓有“三多三少”之座右铭——“多看、多写、多想，少空论、少争辩、少发表”，其实也就是多去踏实地积累、自我感悟、少轻薄地谈论的意思。在我这个年纪出书，其实是违背了这样的原则的，或许终还是在机会面前有小小的自私在作祟吧，不过，其实到本书完稿之后，我已大抵看开这些事。我一向很少，也很不愿意参加各种比赛、征文等出镜、露脸的活动，在我的同学中，不乏在媒体上出足了风头者，我诚心祝贺他们，但一向自觉这种事不适合我，以致有时会拒绝学校让我参加的活动，还被老师戏称作“不爱校”。我何尝不知道早出书将会带来种种纷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黑材料”，但周围的人和现实中的一些压力影响我太多，使我忍着写作时的惶惶不安，把压力转化成尽力把书写好的动力，尽管我清楚我是写不出自己心中满意的水准的。

几年来，我读书、写作的时间都是在上学之余分秒必争地挤出来的，其间还承受了不少心理和身体状况的压力，个中辛苦，积郁到让人欲语无言。当初写这本书，其实是有点意气用事的，望着这部书稿，想到许多师友的鼓励，我其实感到很惭愧。未来的日子，希望自己能沉稳下去，多读书，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生活氛围，能走出现在较为沉郁、封闭的生活。尽管我清楚，不论如何用外界的现象障碍自己的认知，人们都总要面对自己内心孤独的感受。

是为后记。

15、《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79页

北宋新儒学运动的主流是对汉代以来儒学神学化发展的反动，倡导反对汉唐注疏与讖纬学，直抒己意。其萌芽于中唐。到了宋初，在学术上影响巨大的士人，其思想普遍如恭三先生所述，是“以儒家为本位而又对佛道两家兼容并包”。直到庆历之际，范仲淹、欧阳修等方才正式主张发扬纯粹的儒学。这场运动尊奉韩愈的“原道”思想，反对对汉儒杂糅、阴阳五行的神学化儒家，强调人文主义，近似于欧洲由中古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打破神学的运动，所以陈来说宋代新儒学运动是“亚近代的理性化”运动。这场运动和唐宋之际的古文运动以及禅宗的世俗化运动并行，同时还附带起了“孟子升格运动”以及新《春秋》学运动。

16、《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69页

《忧乐为天下》

传统观点认为，宋代的相权是被削弱了的，吕思勉就曾说：“宋代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就是防弊太甚...宰相的权柄太小”。除了有作为正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有副宰相参知政事，掌兵权的枢密使，掌财权的三司使，行政、军事、财政权力划分开，各自方面的长官都直接归皇帝领导。宋太祖通过这样的办法解决五代臣强君弱的问题。然而从制度的实际执行和效果上来看，宋代相权其实不仅没有被削弱，而是被加强了。诚然赵匡胤想法很好，但客观的政治事实却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如果将“宰相”的定义看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等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执政集团，那么，“大量的宋代史：料展现给我们的事实是：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重。有宋三百年的政治舞台，基本上是由这群掌握实权的宰辅导演的，而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

17、《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39页

这些对新政失败之因的总结，大体上无非是谈到三个面，第一点是宋仁宗对新政发生了态度上的转变，第二点则是过度党争的现象对新政起到了负面影响，第三点是革新威胁到的既得利益者太多。

从这些总结可以看出，以往对庆历新政夭折的归因往往集中于外因上，不论是宏观上政治势力间的抵触，还是微观上一些特定事件和人物的作用，其实论述得很详尽了，无须赘言。这些总结所缺少的，是对改革派自身问题的分析，陈荣照尽管提到了这点，但笔者并不能认同庆历新政只是吏治改革，进而更不能认同范仲淹只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范仲淹的改革有着长远且全面的规划，他兴学、改良士风，这都是在为从下而上改革而努力，且过度强调君主意志对新政产生的作用，甚至将之归结为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和本书的相关说法不同。

关于改革派内部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之中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士人党争意识的问题，其二是士人性格做派的问题。

18、《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70页

就像《宋史》所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早年的欧阳修在庆历之际所作的文章大多言辞切峻，以致树敌太多。在我看来，人在政治斗争的氛围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区分敌我的意识，太过鲜明的敌我意识，使得国事讨论失去了理性精神和以改革胜利为先的立场，变成党同伐异、意气之争，而不是为理想和事业而争。我们从欧阳修、石介的激进言论就可以隐约看到以后北宋党争恶化的趋势，当党争只是一种纯粹的站队行为，它就不再是士大夫参政的优选手段了，尽管禁止党争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任何一种集中意识形态、缩紧言论渠道的做法都有着不可取的独裁倾向。

19、《忧乐为天下》的笔记-三

1.作者对庆历新政定性：以现实问题为导引，以祖宗故事、祖宗之法为幌子，本质上立足长远，志在进行深层、全面改革的一场政治运动。2.欧阳修：“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矢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生逢其时，便要有一番作为功业；矢志时，则要有所退隐，寓情于文，把自己的文章写进文章。

同样地：“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士达则寓意于功名，穷则潜心于文翰。”3.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夹杂着大量的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表现了他著史的教化目的。所以《新五代史》服务现实的意义是大于其本身的史学的价值的。我评：方向很危险，有点类似于《大秦帝国》和《于成龙》了。

作者：史学从来不是纯粹的纪实，它总是一种由书写者进行的被动或主动的史料裁剪、一种选择记忆，史学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就体现在它对个体思想或主观认识的表达功能。4.地方兴学为儒道传播和宋代文治的巩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日后明儒以地方学校和书院在乡里传道、促进儒学在基层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王阳明书院讲学、明末思想家们鼓励学子在书院议政。5.魏晋隋唐重血缘门第，宋代，政治结构中的人际关系更多是由师生、学派关系来维系。6.作者：儒家不反对变革，但反对

《忧乐为天下》

变革中的不和谐。7.士林在士风过渡期的矛盾性格——他让范上台是希望新政，可新政真的来了，他们有对之持保留态度。这是士林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过渡期特有的现象，大家还不太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强烈冲击，所以虽然欢迎新政，但又对大幅度的变革有些不太能适应。

“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8.熙宁党争争的是要不要激进变革，庆历党议争的是要不要变革。9.包弼德：“两种专制主义”：统治者对他的官僚有任意支配的权力；政府对人民有任何支配的权力。10.“风势”，少数事物慢慢由弱势变强势，又去触动多数事物，最终形成风势。时代的气质或许就是附着在这种“风”之上的。士人间流行的“风”就是好论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学之“风”是“道”在“文”先，让文学写作在本质上成为一种道德实践。11.我评：“得君行道”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实现自己儒道斯文理想唯一可行的途径和载体。“天下何物最大？”赵普：“道理最大！”

20、《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7页

总览北宋初年的宋辽关系，两国之间是以战为主，但在相互攻伐中力量渐渐趋于均衡，因而必然会萌生出“和”的趋势。不过平心而论辽在军事实力上还是胜过北宋一筹，只是辽朝统治者有意与宋和好，因而契丹并未发动大规模、具有持续性、指向性明确的征伐北宋的战争。

辽朝在景宗以后便是圣宗耶律隆绪在统治。圣宗即位之初，其母承天太后萧燕燕临朝称制。萧燕燕形容当时的辽朝是“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母寡子弱”自不必说，“族属雄强”则是由于辽朝长期受到北宋侵扰，以致一些契丹权贵打着防备北宋入侵的名号趁机发展势力。

北宋由于受到西北战事的牵连而慢慢开始有意与辽议和，而承天太后为了巩固内政也希望能够与宋议和。

21、《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10页

“斯文”说的是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礼乐名教是文王时代理想的儒家式政治秩序。这种“斯文”是唐宋时期积极政治士大夫在国家出现问题时希望恢复的一种状态。

22、《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05页

此时（主政后）的范仲淹是五十四岁，正逢中年，而追随他的官员多数不过四十岁，整个庆历新政集团是由中青年官员组成的，这样的组合有利有弊，年轻的面孔充满朝气和激情，这与改革的气质是天作之合；年轻的官员过于激进而缺少稳重、言论对保守派的刺激性太强，显露着他们缺少足够的政治经验，特别是欧阳修、苏舜钦等人。这为以后新政的失败也埋下了伏笔。

23、《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323页

好为历史解释建构范式，这大抵是近代以来海外汉学的学术特色。民国学人中有不少人受汉学学统，从而使得现代学术承继了这种旨趣。当然，谁都不能否认，范式是史学发展、进步的产物。但是由于人们对已佚失史料状况的不可知，因而即便某一史学范式很巧妙，也难以确认其不是一叶障目的管窥之见。

范式是解释模板，范式本身不会是史实。如果不考虑研究学术史和史学史，在历史研究中太执着于构建史学解释的范式以致忘却了构建范式本身也不过是寻求历史真相的途径之一，这种研究实是有买椟还珠、舍本逐末之感。

没有一种解释范式能涵盖所有历史，史学永远只会带来无限趋近真相的可能。历史的难以捉摸，恰在

《忧乐为天下》

于它有存在真相的合理性。但学人发现的真相却永远不能被证明其合理。这种难以证伪的特点，恰是历史学之生机的源头。历史学固然强调对材料把握全面、逻辑推理的缜密，但是历史解释有时更像是在展现一种话语的艺术。话语、范式是已有学术经验的结晶，但学人也不能忘记范式只是工具，而且，其并非唯一的工具。放下已有的范式，往往才能开拓新的研究。

史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然而解释本身有着过强的主观性，所以历史解释很难避免想象的色彩。范式对历史的过度解释其实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过度想象。精明的治史者，应当努力去将想象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且不该对历史想象寄予太高的期盼。然而，想象的感受实在太过迷人，让学人在想象中保持克制和理性，这实在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史料中确实常常会出现一些关乎事件过程等方面的空白，然而，没人能保证学人对这些空白处的历史想象就一定是合理的，更何况古人不见得思维与今人一致，古人掌握的信息也不见得与今人一致，今人想到的“理”永远不能被确定其合乎古人的“理”。置言之，“想象”作为行为，在一些情况下具有合理性，但是“想象”的内容合理与否，这是不可证的。

太寄情于历史想象，难免会以今度古。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尺度也很难把握，学人一不小心就会刻意地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去硬套历史，甚至是把一些现代思维当作是古人已有的想法。沉浸在范式和历史解释的话语中，在想象之上完善想象，这样的史学研究，其宗旨或许已经偏离求索历史真相的目的了。

24、《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4页

与宗教人士的交往无疑对朱说个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他并非一味地吸取儒家思想，对佛、道也有涉猎，日后他主持新政，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来自于《易经》的思想。而当日后总结出“先忧后乐”的士大夫人格后，也有人就认为其中有他受佛教众生平等观点的影响。

25、《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4页

五代对北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藩镇的频繁叛乱使得宋太祖建国后严格限制了地方的权力，北宋统一过程中的杀戮、血腥也影响了那个时代。所以，大抵像是逆反心理一样，北宋社会的崇文风气很是昌盛，谁都不能否认这其中经历了北宋统一战争后的百姓厌烦、畏惧战争的缘故。由此，北宋开启了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

26、《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3页

然而，滕子京为政不重民生却兴修楼宇，按照常理这不是仁政，仲淹又怎可能为之作下“政通人和”的断语呢。原来，滕宗谅重修岳阳楼时的集资办法，是昭告百姓，但凡捐献便可销抵在官府的旧债，他不久就集来了一万缗。因而在岳阳楼建好后，岳州人里没有人非议这项举措，反而人人称赞滕宗谅的行政才能。

27、《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51页

《正统论》想要谈的并不局限于其被写作时的当下，而是要讨论一个长远的有关标关标准的问题。欧阳修提出，在三代之后，由于僭伪兴而盗窃作，所以出现了两种政权，一种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即疆域没有统一却属于正统王朝，比如东周；另一种是“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即疆域统一却不被奉为正统的政权，比如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认为有必要重新讨论“正统论”的问题。欧阳修划定的正统王朝，是夏商周秦汉、西晋、隋唐，这些时代中间的“东晋后魏之际”和“五代之际”因为天下大乱，所以在这些时期无所谓正统。而宋，则被他称作“与尧舜、三代无异”，是正统王朝。

28、《忧乐为天下》的笔记-二

《忧乐为天下》

1.文道结合之时，置道于文之先。这是庆历文学的主旨。2.范仲淹《灵乌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3.以文学结盟的形式来表达政治结盟的意向，文学与政治的交融、互动是北宋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4.“文不换武”（文职不换武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宋武人势力的不兴。黄宗羲认为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作者大胆地认为宋代的“抑武”在一些时期和情境下是一种国家意志和一部分士大夫的意志的所导致的不自觉的行为。作者认为宋史研究需要分阶段、分角度，从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几个方面来细致考量宋代文、武关系。5.民族的血缘认同建构往往是通过内向途径强化的，而文化认同建构往往是通过外向事件强化的。宋夏战争作为一个外向事件，强化了党项民族共同体的本族意识。6.“夫文，传道而明心也。”7.儒家的终极理想是明确的，而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可以变通的，可以通过对立的再诠释而使之对自己的行为有利。封建儒学史本身就是在大道既明的前提下，儒生们不断地儒道主义发挥、诠释的历史。我评，某历史学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8.北宋士大夫形象的代表，他们会因私利而朋党，他们同时有着超越朋党的更大的价值观背景，这种群体意识使他们拥有共同的国家立场和政治理想，本质上，都是为了儒家理想和宋朝国运而努力。“君子党争”背后，能看到的是士大夫们为实现儒家的整体规划而做出的努力，“新旧党争”只是具体方法、具体判断之争，在政治理想上并无根本的不同。我评：争吵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努力方向，否则争吵就是浪费时间。像国、民两党的争吵就毫无意义。！！9.“斯文”是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礼乐名教，是文王时代理想的儒家政治秩序。包弼德描述唐宋士大夫对“斯文”的认识和运用时说：“唐宋学者也认识到，在政治陷入危机的时候，斯文会丧失。为了挽救斯文，挽救时代，学者们总是能回到上古和自然秩序，以此作为共同认可的规范的基础。”

“斯文”和古文运动也是相辅相成的。“斯文”本身在一些时候也指代古文。“斯文”，就是以古文为媒介，而成为儒家士大夫所推崇的价值观。

在积极政治背后，真正想要做的是传承和发扬一种儒家式政治思想和理念价值，而非单纯维护一个专制政权。在范仲淹那里，维护社稷是为了匡扶斯文，前者有时是后者的行为载体；正是有了对斯文的追求，才会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积极投身政治。我评：当代的知识分子也应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高追求，以免被政治利益左右。10.范仲淹在班簿上看见自己认为无能的官员的名字就用大笔勾掉，富弼劝范“十二丈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结果范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我评：范在个别情况下有推行强人政治、个人专断的倾向；但专制社会不实行法治，是实行人治，遇到问题力图依靠个人力量进行推进，而不是依靠法律和制度进行推进，这几乎是专制社会进行行政改的固有弊端。

范、欧阳修等人晚年趋于保守，可能是对先前改革中过于激进的态度做出了反思，转向温和改良。范不是绝对的儒法家，他比王安石更温和。

29、《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46页

结合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征，张其凡又谈到，“作为士大夫中地位最高的宰相，可说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其权力与皇权是相辅相成的”，并认为这恰可以印证文彦博所说宋代“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此外，钱穆、杨果等人所持的宋代相权削弱说通常只是关注了北宋初年的相权，认为枢密使、三司使瓜分了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的军事权与财政权，且台谏也制约了相权。对此张其凡认为，“参政分权、枢密分权、三司分权、监察分权”其实“无异是说助手与具体主管部门可以分去宰相的总理之权，其之不能成立，不言而喻”。从制度实施的角度看，三司使在元丰五年就被归入户部，而宋代历史上也不乏枢密使被宰相兼任的现象。比如文天祥就在德祐二年被任命以右丞相兼枢密使，北宋庆历年间迫于外交紧张和内政弊端的压力，宋宗就实行了宰相兼枢密使的制度，庆历三年推行新政时，平章事章得象就兼枢密使。到了南宋宁宗时期，由宰相兼枢密使甚至成了朝廷定制。且即便宰相和枢密使不是一人，也不代表就必然会互相牵制。比如庆历新政时的枢密副使富弼和参知政事范仲淹，他们在革新问题上有着同样的政治主张，虽然由于专制国家的官僚体制本身起到了某种政党式的作用，所以革新派不可视作政党，但当时的齐力革新的“两府”完全可以视作同一政治派阀，因而枢密使和三司使在宋代并未始终起到削弱相权的效果。

30、《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47页

《忧乐为天下》

不论是《五代史记》还是《正统论》，它们所要建立起的历史书写的框架，必然都是服务于书写者的个人目的。史学从来不是纯粹的纪实，它总是一种由书写者进行的被动或主动的史料剪裁一种选择性记忆，其实所谓“一手材料”，不论是正史、野史、口述史，其实都是“二手”的。这并不是说史学不去求真、不能求真，而是要强调，史学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就体现在它对个体思想或主观认识的表达功能，这之中，历史学家的存在尤为重要，是因为有了历史学家，才有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实为“历史事实”的“历史”。史学理论大家杜维运在讲何为“历史”时就凝练地总结过：“一般性的事实变为历史事实，完全系于史学家。史学家在浩瀚的事实中，选择自认为有意义的事实，使其变为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在量的方面，占一般事实的绝小部分，历史则系历史学家根据历史事实写成”。

31、《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61页

在宋代，“台谏”二字哪怕是皇帝都不能小觑。对于君主官僚阶层而言，台谏官们是与之并驾齐驱于中枢权力结构中的。尽管宋代台谏系统运作的历史轨迹不断有着时振时衰的波动，然而从总体来看，作为中央检察权的直接承担者，台谏与君主、宰执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三方制衡的格局，并且由之使得宋代中央权力层出现三权制衡的趋向。诚然，政治制度由政治文化所决定，但直接造就时代政治特征的是政治制度，就如东晋门阀政治与九品官人法有关一样，台谏制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宋代党争政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言官势力作为对行政权力批判的一方，其对政治的影响力之强是不言而喻的。

32、《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137页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庆历新政是一个开始就注定夭折的改革。因为它铺的局实在太太大，牵扯的人太多，且其产生只是源于士人间在具体层面存在认识差异的笼统的忧患意识。宋代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文治时代，这种宽松的舆论环境利于士大夫借助舆论上台执政，然而，宰相、参知政事等执政在这种台谏文化浓厚的政治环境中也注定成为被人习惯性批判的对象。这是宋代革新运动的宿命，士林似乎总是缺少对改革主持者的足够耐心，这就让对新政不满者很容易制造事端来削减革新派的声望。

33、《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214页

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对改革缺乏耐心，这好比晚清的革命党，他们都主张激进的变革，要大刀阔斧、立竿见影，受不了温和改良那磨磨唧唧的样子。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年纪较轻的改革派士大夫中，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其实范仲淹在“择官长”时的做派都够峻刻了，不然也不会引起富弼的担忧。但在一些更为激进的士大夫那里，这只能被视作扬汤止沸的小打小闹。保守派和一些支持变革却又受不了骤变、剧变的士大夫对新政阻力太大，支持改革的士大夫对新政的速度和力度又要求得太急、太强。这都是导致范仲淹对改革失去信心，或者说感到心灰意冷、无可奈何的原因。

在本书前文中已有交代，范仲淹的改革本身只是以当下的现实为引子，本身有着更全面的考虑、更长远的规划。但是这种远见并不易为常人所理解和认同，改革派士人中有不少都主张先解决当下，甚至他们认为只解决当下的问题（主要是边患和财政紧张）就好——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政的夭折正与宋夏关系的缓和有关，西夏对宋称臣使得一些目光短浅的士大夫从积极革新重新转回保守，改革的任务在很多人眼里不再如过去那般迫切，于是支持新政的呼声旋即弱了很多。

庆历新政并非诞生于北宋积弊最严重的时期，如果没宋夏战争的压力，那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或许只存在于一部分士大夫的意识中，尽管这一部分有先见之明的士大夫无疑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但那种极为强烈的紧迫感并不存在于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中，甚至在所谓的革新派士人那里，救弊也并非在每个人那里都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加之并非所有革新士人都保持有跟仲淹一样的思想水平和长远目光。这种士大夫间眼界、认识的差异令范仲淹的新政无论怎样都难逃苛责，士大夫们对改革与否以及改革的程度缺少充分的共识，这也正是范仲淹的无奈之处。

《忧乐为天下》

范仲淹早就慨叹过“事有先后，而革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范仲淹布得局太大，短时间看不出成效，可这却为他引来谤毁，他明明想做那么多也做了那么多，可到头来苏舜钦还说“今朝廷之患，患在执政大臣不肯主事”。由此再看范仲淹在庆历四年上半年多次提出的想外出巡边的请求，这之中多少有赌气的意味，既然没有人理解他，那他不如专注边事，远离汴梁的是非。于是自打范仲淹于六月去了陕西，新政便基本陷入了僵局。

34、《忧乐为天下》的笔记-第311页

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北宋的庆历新政作为一场以内政改革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总体而言，它涉及的问题是全面的，而非专于吏治，只是在吏治方面有所侧重。它以现实问题为引，本质是布局长远的改革，而非局促于当下。

它的产生，不仅与北宋士大夫社群自觉意识的高涨有关，积贫积弱的现实状况对出身寒门的士大夫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激励乃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其中特别要强调，发生在仁宗宝元、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对于庆历新政的产生起到了现实层面和思想层面的直接推动作用。巨大的边患压力加剧了政改，特别是内政改革的需求；同时也致使士大夫：产生了以巩固国家自身实力来增强对对抗外患之能力的政治思想。

庆历新政是被士林舆论抬起的改革运动，虽然宋仁宗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支持行为的本身乃是内外交困的现实压力以及士林呼声的舆论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且我们不能过度夸大这一时期北宋内政问题的暴露程度，宋代士大夫在文章和进言中常常会用一些情绪化的表述或者夸大的情况来强调个人的见解，他们以此作为一种讲演手段，这使得后人在阅读史料时常常被他们诱导而产生罔顾逻辑的误判。

实际上，庆历之际北宋的弊政，远没有士人描绘的那般严重，其复杂程度也比不得王安石变法时所遇的问题，新政的产生主要源自士人的自觉，也正是因为士林支持新政的基础只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自觉而非绝对迫切的现实窘境，因而同样是支持新政的士人，他们对新政的节奏、手段、力度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不同认识，这种深层的分歧使得新政在开始后不久即在一些问题上遇到部分支持新政的士大夫的异议。这些内部的分歧比外部的压力更致命，最终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支持新政的士大夫群体的向心力，从而成为导致新政中止的因素之一。

它的主要影响，则是改良政治（世族政治的衰落）、振作士风（对“祖宗之法”下颓靡士风的改良）、“救斯文之薄”（维护儒家道统、实现儒家式社会理想）、“觉民行道”（“宋初三先生”带动下宋学的兴起与传播）。由于北宋在仁宗朝所面临的危机相对而言很有限，且仲淹的改革本身就效果有限并还以失败告终，因而庆历新政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作用有限，它更多的是在改良无形的东西。所以庆历新政和范仲淹个人对后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弘扬儒家士大夫积极正直的精神。

同时，要指出，庆历新政在某种程度上是士权高度膨胀的产物，这场改革在客观上起到了冲击皇权的效果，其夭折虽然与保守政治文化的反击有关，但最终却是以皇权压制住了过度自由的士权为结局，但是，没有这一次士权尝试突破皇权来取得政治变革自主权的实践，后来宋代相对宽松的士权环境要形成恐怕不易。

它的性质，从本书的立场来看，不如称作“新兴士大夫社群企图挽救政权危局和复兴儒家道统的改革尝试”。另外还应强调，整场新场新政中所活跃的政治人物，亦即“11世纪中叶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新兴政治派别，就是宋朝第一代独立探索儒家文化价值的士大夫群”。

《忧乐为天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